责任编辑：戴菁　E-mail:daijing314@163.com　电话：010-62805132　　2014年5月5日

学者需要怎样的“担当精神”

□董　洁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瞩目成绩的同时，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随之产生，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值此，作为社会的良心、民族的先知、时代发展的助推者，中国的学者需要怎样的“担当精神”？

学者的担当在于学术的求知。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下，中国学者的求知已不仅仅局限于对自身专业领域知识与思想的探索，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这就是面对当今中国的求知。学者所具备的知识背景，使得他们能够敏锐地洞悉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的动向和需要。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转型，中国学者所肩负的重大使命之一，就是运用手中社会科学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认知，对中国深度问题进行剖析。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僵化保守走向改革创新，在改革的喜悦与阵痛中，也沉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题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问题本身所具备的特殊性非域外学者所能理解，这就决定了问题的求解，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采用中国的思维与智慧。长期以来，学术领域内占据主流地位的多是西方的理论、概念，中国原创性的学术概念、学术思想相对式微。不可否认，这些舶来的理论对于开阔视野、刺激思想确有益处，但对于准确深刻地认识中国，尤其是身处转型期的中国似乎并不能完全切合。用西方的理论和话语去解读中国的问题，难免会有“水土不服”之嫌。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学术圈需要强有力的“中国声音”，而这一对“自我”进行认知和剖析的过程势必要由中国学者来完成。天降大任于斯人，中国学者必须有所担当：透过现实的层层迷雾，去探求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道路，将个人际遇与国家命运相联系，成为民族无限的创新源泉和不竭的动力。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普通民众加深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而且有利于国家决策层面对中国路径的构想。当然，在中国问题的认识和探索之外，置身于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学者的目光也应有所延展，对寰宇世界同样也有所关怀，具有世界眼光，从更广阔的维度来审视中国与世界，做到所谓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求知的过程漫长而艰辛，学者应当持有一种求真而友善的态度，这也是中国学者所应具备的担当理性。中国当下的社会问题纷繁芜杂，唯有建立一种理性讨论的方式，才有触及问题症结的可能，才有找到对症下药良方的希望。

学者的担当在于道德的坚守。这份坚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商业化的社会中不受利益所诱惑，保持学者情操；二是在网络化的社会中不受浮名所左右，保持学术品质。由于市场经济的兴起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呈现出利益为上、人浮于事的乱象，学术的独立性和求真性受到严重侵蚀。从文章抄袭到一味追求商业利益、自身利益的贪婪，从沽名钓誉到拜金主义日渐泛滥，某些学者忘记了其最根本的志向，纠缠于各种名利是非之中，到处在为其自我利益张罗奔忙。所做之学问，极尽忽悠之能事，或应景或奉命，学者风骨全无，媚态几许，极少数人甚至违规违法。学者所应有的斯文与高贵尽失，更勿论尊严与独立品格。触目惊心的“学术腐败”和“文人无德”的现象在不断地挑战着人们的精神底线，社会对学者道德的质疑声不绝于耳。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其著作《论学者的使命》中提出，学者应当把提高人类道德风尚作为其为社会领域服务的最终目标。费希特借用耶稣曾经嘱咐他的门徒们的话说：“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西方人说“知识分子代表社会的良心”，中国的学者也要做“社会的良心”“人类良知的守夜人”。而为学术而学术、追求独立自由，其本身就是品格操守的最高表现。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因生命困惑而投湖自尽后，陈寅恪亲自为其撰写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学者许纪霖曾撰文反思，当代知识分子“在观念的启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没有留下道德遗产，很少像民国那代知识分子那样有德高望重之誉。”今日之中国学者，不必学习王国维以生命捍卫思想奔放和学术自由的决绝，但也当学习王国维的学人风骨，一生从不写一篇媚俗文章，从不为“遵命”之作无感而发。

学者的担当在于文化的传承。学者不仅是学术求知领域的承担者，也是文化传承领域的践行者。学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应的是“士”或“读书人”这一阶层。中国古代的士文化，提倡读书人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热心于对社会做出贡献。从孟子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气魄，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无不说明中国传统士大夫普遍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的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是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家国情怀观表现得淋漓尽致。到了近现代，这种“关心”的精神传统依然跃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中。中国近代史上一连串救亡图存的运动，无论是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其领导主体均来自知识精英阶层。一代大儒梁漱溟目睹政治动荡、民生凋敝的民国社会，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长文，并印册分送，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舍我其谁的社会使命感。千百年来，以士大夫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用一种超越性的“道”来批判现实社会，维护着中国社会的精神价值。中国知识分子所持之“道”，一方面代表了超越性的精神世界，一方面又不是脱离世间的，不离世间以求出世间，这使得中国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成为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在这样独特的思想背景之下，最终形成了顾炎武所谓的“明道救世”的文化传统。正是因有着这样的思想渊源和文化血脉，中国的知识分子才会每每在社会危机的时代挺身而出，用他们的“道”来“拨乱反正”“纲纪社会”。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经世累月所形成的担当传统。伟大的传统需要后人的继承，若没有当代的传人它便不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中国学者有必要担起此重任。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所怀有的求真务实的学风、忧国忧民的崇高风尚以及追求人民福祉的使命感在今天仍具有当代价值。文化的传承在于传统和精神的接续，中国学者需身体力行。中国的文化传统需在学者处传承，中国的学术思想需在学者处复兴。

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曾留给世人一段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翻译成现代汉语，可以解释为：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如果说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其担当所做的凝练概括，那么这一概括对于今天中国的学者仍具有启示意义，亦可作为中国学者当代担当内涵的极好注解。

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智慧头脑的涵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有担当的学者：他们有知识阅历，有高深思想，能见微知著，能运筹帷幄，学人的基本素养使得他们从未放弃追求真理与思想独立的执着，中国传统士文化的现代延续使得他们从未停止对民族前途的忧虑与思考。李大钊曾说，“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最艰难的时候改造国运”。中国学者应以推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为己任，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为目标，在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充分发挥其学术担当、道义担当、文化担当，主动承担起社会和历史所赋予的使命。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

学术评论

文化自觉与核心价值观建设

□扈海鹏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已在全国兴起新的热潮。“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文化战略，是面对中华民族繁荣复兴的一种文化自觉。

核心价值观的阐释需要重提文化自觉

任何社会共同体都是文化共同体。核心价值观反映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理想与追求。核心价值观的阐述与建设，是文化自觉的体现。人是符号动物，人类生活依赖符号价值的认同而生存。人类早期生活的礼仪、图腾、宗教、村落习俗等，都是不同文化群体所看重的基本价值取向。其结果是塑造了一种规范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人的意义世界。所以，文化自觉，其实是一种文明自觉。不论是那些古老文明国家，还是现代民族、那些成熟的现代国家，无一例外的都是如此。一个民族对核心价值的解释，关乎它的文化传统、社会理想、行为秩序，构成了它的文化优势与特性。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述，“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在50个以上的世纪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中国人没有停止过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中国古人所推崇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将厚德载物”，“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等理念，反映出儒家文化传统的哲学理念，其价值自觉与文化自觉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文化复兴到19世纪，欧洲社会进化、进步、启蒙理性的理念，同样具有很强的价值追求、“人的自觉”，最终形成“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的文化诉求，支撑、影响了现代化的进程，成为一种文明遗产。

今天，在全球化以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国家的价值目标提出来，既包含了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肯定与追求，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认同。

面向全球化，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

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把不同民族日常的经济与文化生活联系在一起。通过全球化的开放性来展示不同国家的“伦理风景”——使各民族找到文化观照的“镜中我”。这是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全球化现实。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世界各民族已处于跨文化、跨民族的学习、比较阶段，孤立生存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引领社会思潮，引领社会全面进步，集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展民族现代化进程的政治自觉。

以文化自觉加强核心价值观建设，要有问题意识。中国社会转型正呈现出多阶层价值秩序的混乱。郭美美事件、“老人跌倒扶不扶”的问题、雷振富事件、厦门公交车爆炸事件、复旦研究生投毒事件等问题出现，都不是孤立的。它们显现出当代中国社会失范、信仰缺乏。凝聚社会共识，要解决好底线秩序、底线伦理的问题。底线伦理，就是中国文化讲的“和而不同”，“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界限。为此，我们特别需要形成“市场化社会”的文明秩序，重建敬业、诚信的“礼义之邦”。

以文化自觉加强核心价值观建设，要以教育为基本途径，推动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教育是文化的再生产和价值观的塑造。教育，要启发人生活的意义与理想，（它应包括国民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在价值观塑造中起到根本性的作用。教育的重心应是与全球文明相接、与文化传统相接的人文素养，要让年轻一代真正领悟、体验人文精神的基本涵义，使之成为民族的文化工程。培育以公民素质提升为基础的新习俗、新风气，落实到社会个体、群体的日常习惯中。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只靠文化产业园的产值是堆积不起来的，更不可能只靠媒体工业的国民生产总值创造出来。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一种价值观的吸引力、影响力、感召力。没有价值观的力量，就不会有文化影响力、文化吸引力。

以文化自觉加强核心价值观建设，要推进制度、制度文化的完善。最成功的社会治理，是将文化融入制度，用制度体现文化。我们要探讨“什么样的制度能培养成好的习惯、好的管理风尚？如果大家都只相信潜规则，那就说明制度管理的无效。价值观、习俗、道德的认同，应重视制度、制度文化的培养。如社会保障制度、公共产品的均等化、社会分配制度等。通过不断完善与公平、法治相关联的基本社会制度来重塑社会价值取向的基本维度。除此之外，还需要建立健全中观、微观的制度、规则。让“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价值内涵的贯彻，既表现为制度文明的结晶，又成为社会和个体正向的价值追求。

以文化自觉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要把价值观学习与心理建设结合起来。制度、理性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文化自觉，意味着要文化个体依然会直面很多转型期的利益冲突、会面对很多无奈的选择及心理纠结。核心价值观学习，应该走向信念、信仰的层面。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意义的中国人，对人、社会、历史的认知框架，不是西方的“主观”“客观”二分体系。中国的世界观，更像是一种基于“内”“外”的思维维度。中国人懂得更接近“内”的概念——“心”这个范畴。如“将心比心”“心平气和”等词，是把“心”作为自我、人际关系、内外平衡的一个核心概念。中国古人谈及的“诚、正、仁、爱、恕”等，恰恰就是今日社会所追求的真诚、共存、和睦、温和、宽厚，其文化语境包含了自我体验、心理修养与道德伦理的认同。今天，我们依然需要以文化传统的“智慧”来引导伦理生活与心理生活的平衡，不断加强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提升公民素质，形成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

（作者单位：江苏省委党校）

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的症因与索解

□吴　琼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的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数量巨大的中小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如独立工作室、时装设计公司、小型文艺公司等，依靠自身灵活而富于创新的优势，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已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主力军。在某些文化领域，一些发展较好的非公有制文化企业成为核心力量，如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分众传媒、新浪、网易、腾讯、搜狐等一批娱乐及互联网媒体企业的出现。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允许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改制经营。支持各种形式小微文化企业发展。”贯彻落实《决定》精神，必须梳理好影响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的制度性、体制性制约因素，正视制约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的症因，并探索发展症结的索解。

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的症因

从文化市场主体地位看，非公有制文化企业与国有文化企业相比仍处于弱势。据统计，目前我国文化企业中约90%处于初创期，约7%处于成长期，真正处于成熟期的仅占2%。由国有经营性事业单位改制的文化企业占据了市场主体，如广电集团、报业集团、出版集团、演艺集团等，掌控了主要的优质资源和领域。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只能从边缘性产业切入，起步就占劣势。这种由“身份地位”带来的不公平待遇成为阻碍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近年来，国家和地方虽然出台了不少相关的支持政策，但从实践来看，很多政策缺乏可操作性，缺乏支持和服务的有效平台，仍存在包装多内容少、原则多细则少、弹性多刚性少、门槛多实惠少的问题。

从融资渠道看，非公有制文化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直接融资渠道少，金融品种单一，投融资服务体系的缺位，增加了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融资难度。2010年4月，中宣部等九部委《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有力推动了金融机构对文化产业的扶持，但从地方实践来看，金融机构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大多投向国有文化企业。以智力投资为主的大多数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其资产主要表现为商誉、知名度、知识产权和品牌价值等无形资产和轻质资产，而金融机构对于固定资产不多、稳定性不强、现金流不确定、缺少抵押能力、成长周期长的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往往是望而却步。同时，市场又缺乏能够提供非公有制文化企业无形资产抵押物变现的中介服务机构与平台，导致能够真正获得金融支持的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少之又少，即便获得贷款，额度也是微乎其微。致使许多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尤其是小微文化企业，普遍缺乏金融支持，严重阻碍了其发展与成长。

从管理服务看，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外部管理服务有待完善。当前相关法律法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还不够完善，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缺乏强有力的法制保障。从准入程序看，在文化市场行政管理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多头执法等问题；从准入成本来看，民间资本要独自面对复杂的规章制度和多层人事关系，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往往为获取程序准入方面的信息要增加大量的交易成本。一些地区和部门对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只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上，服务意识淡薄，存在着“两头热、中间冷”的情况，即省、市、县领导和企业热，政府职能部门冷。这种文化市场管理上的缺失现象造成各部门分兵把守、政出多门，政策间相互冲突、缺乏衔接，无形中增加了企业负担。

从自身情况看，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内部管理意识不强。缺乏完善的财务制度和现代企业管理机制，作坊式经营和“小富即安”心态较为普遍。小进则满、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家族化”管理思想，直接束缚了企业的创新与发展。企业缺乏人才战略思想和人才培养规划，人员流动性大，人才储备相对匮乏，特别是文化创意人才、中高级管理人才以及复合型人才存在短缺的问题。加之企业自身培训不足，导致企业决策能力、创新能力、经营管理水平等难以跟上时代和市场节奏。

从品牌创新能力看，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产品科技含量水平不高。非公有制文化企业数量和规模虽逐年增多，但科技含量高的产品不多，知名度高的品牌太少。品牌创新能力不强，高新技术水平较低，引进模仿多，自主开发不足，这些都成为制约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的短板。

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症结的索解

促进我国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与繁荣，必须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大政策和法律支持力度，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畅通融资渠道，充分释放非公文化企业发展的正能量。

制定完善政策、规划，支持企业有序发展。首先必须认知非公有制文化企业是我国文化产业格局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快速发展的基础力量。其次要将非公文化企业的发展纳入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纳入到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布局，将非公文化企业项目纳入到政府对文化产业扶持的对象范围。再次要加快国有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步伐，支持非公有制企业以合资、合作、参股、持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到改革进程中来，活跃整个文化产业市场。

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优化公平竞争环境。要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解除一切限制非公文化企业市场准入的不合理规定，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按照“非禁即入”原则，放宽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促进国有和非公有制双轮驱动、公平竞争，特别是在项目审批、资质认定、融资等方面，给予同等的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和金融环境，享受一致的“国民待遇”。

实施文化金融扶持计划，破除投资融资瓶颈。2014年3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和《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随后，文化部、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三部门又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这些都将会推动文化与金融深度合作，让非公文化企业融资更加轻松、便捷。具体应从如下方面着手：第一，支持有条件的非公有制文化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股票上市、股权投资等手段发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可成立由政府主导的非公有制文化企业融资担保基金，帮助非公有制文化企业获得银行融资。第二，提供适应非公有制文化企业投融资需求的中介机构和金融产品。建立专业性的文化保险机构与融资担保机构、权威性的无形资产评估机构与无形资产流转交易平台。第三，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收费权质押等适合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特点的金融信贷产品。第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引入民间资金，构建众多的民间投资主体，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融资渠道的多样化。

推进企业品牌建设，提升核心竞争能力。一要政府加大对非公有制文化企业中成长性强、产业关联度高的文化品牌的扶持和宣传，激发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积极推进文化品牌发展战略。二要制定与完善文化企业品牌保护的政策，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盗冒品牌的行为，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三要重点完善非公文化企业产业链，关注延长产业链开发价值，重视具有品牌效应的原创产品，提升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四要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机制创新，发挥非公文化企业自身在市场灵活性方面的比较优势，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企业项目，运用符合市场经济的手段来推动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打造新的文化服务品牌；培育壮大新兴文化企业项目，对文化产品生产过程和产品进行数字化改造，为用户提供智能化、信息化、快捷化的文化生活空间。

加强人才管理和培养，健全高质量人才队伍。文化产业以创意为主要特征，拥有创新精神的人才优势是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从政府层面来讲，要对于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文化企业人才纳入国家、省、市的文化人才管理体系，构建文化产业人才数据库；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引导文化企业建立创新人才激励机制；通过组织培训、学习考察等方式，推动企业管理者学习和利用先进的管理理念、方法和手段，加快企业创新发展。从非公有制文化企业方面来讲，要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与发展环境，完善相关待遇，实施自己的文化产业高端人才培养计划和引进计划，通过引进和就地自我培育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持续的高质量的人才支撑。

（作者单位：安徽省委党校）

热点关注